

#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朝两国初始传播研究

廉松心

---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中国，天主教在中朝两国都经历了传入、发展及衰弱的过程，但由于两国地理位置及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在传入时间及途径、传播过程及遭遇、发展状况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明末清初 天主教传播 中国 朝鲜

作者：廉松心，1964年生，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

中国和朝鲜是近邻，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社会文化方面有许多共同特征。明末清初，在意识形态领域两国都以儒学作为正统的统治思想；在宗教文化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外来宗教，佛教、基督教等对两国的政治及社会生活都产生过深远影响。本文主要探讨天主教在两国初始传播的情况。

天主教明末清初通过西方耶稣会士的东方布道活动传入中国，又通过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节传至朝鲜半岛，开始了天主教与东方传统儒家文化的接触、碰撞、冲突和交融的历史。

## 一、天主教传入两国的时间及途径

16世纪欧洲处于中世纪末叶，耶稣会以天主教的坚决维护者的面目出现，以布道海外，重整天主教的声望为职志，培养了许多博学的传教士，并大力向东方发展。正当此时，葡萄牙、西班牙为了摆脱奥斯曼土耳其对中西方陆路交通的控制，寻找另外一条到达东方的路线，探寻欧亚之间的海上交通。耶稣会士借此时机和便利条件跟随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探寻队来到亚洲，开始了他们的东方传教事业。

### 1. 传入中国时间及途径

在天主教传入中国过程中最成功的是耶稣会传教士。1578年，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罗明坚（Michael Ruggieff）、利玛窦（Matteo Ricci）、巴范济（Franciscus Pasio）等来到澳门，由于罗明坚熟悉华语，能和中国的官员交流，所以，为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打开了方便之门。罗明坚、利玛窦、巴范济等人为了传教，多次给总督送礼，如地图、浑天仪、地球仪、考时晷、报时具等，两广总督在收到礼物后随即把两座佛教寺院修整好，作为传教士们的寓所和教堂之用。于是，1583年9月，罗明坚、利玛窦、巴范济等人，正式移居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庆，创立了中国最初的传教基地，大力进行传教活动。

继意大利的利玛窦、艾儒略等之后，葡萄牙陆若汉（Jo-hannes Rodriguez）、苏霖（Joseph Saurez），德国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戴进贤（Ignatius Kogler）、鲍友管（Anton Gogeisl），比利时南怀仁（P·Ferdinandus Verbiest），奥地利刘松龄（August von Hallerstein），意

大利郎世宁 (Giuseppe FR. Jos Cas—tiglione) 等耶稣会士也先后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并取得成果。康熙朝后期中国发生“礼仪之争”,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受挫,直到1773年耶稣会士被解散之后,活跃在中国的传教会主要是遣使会、方济各会和外方传教会。

## 2. 传入朝鲜时间及途径

天主教作为一种新的思想和学问即新文化,以西学的名义传入朝鲜。出使中国的使团成员与西洋神父之间的交流及汉译西学书的传入,为天主教在朝鲜的初始传播提供了思想、物质条件。星湖学派<sup>①</sup>的少壮人士,从“补儒论”立场接受天主教信仰,对朝鲜天主教信仰共同体的建立及传教活动中起了核心指导作用。从17世纪初开始,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节注意到已经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的西洋文化,不断地将它带入朝鲜。如早在明末的1603年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李光庭带回了利玛窦制作的汉译世界地图,1631年出使北京的郑斗源从陆若汉传教士处得到了多种西洋科学仪器及汉译西学书及地图,并带到朝鲜。1644年11月昭显世子一行归国时,汤若望赠予他关于天文、算学、圣教正道等方面的多种西洋书籍,以及舆地球、天主像等。曾三次出使明朝的朝鲜实学派先驱人物李睟光,在其著作《芝峰类说》中记载了当时汉译西学书及西洋文物传入朝鲜的事实。此后,朝鲜使臣每次到北京,必争相求得西方有关天文、地理、历算、物理等汉译西学书籍和各种西方科技仪器,为西学在朝鲜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在大量的汉译西学书籍及西洋文物传入朝鲜的背景下,<sup>②</sup>到18世纪,实学派学者中掀起了研究西学的热潮,一些“北学派”的学者随使团到中国,或从单纯的好奇心出发,或从对西学的求知欲望出发,不断地访问北京的天主教堂,并与西方神父交流西学及天主教教理。但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西学中的“器”部分,即西洋的科学技术知识方面,并积极地研究和实践,而对“理”的部分,即天主教教理,则以传统儒学的观点进行批判,甚至排斥。而在李瀛星湖学派学者中出现了以“补儒论”观点接受天主教信仰的信教团体。

李瀛(1681~1763)是朝鲜实学思想的巨匠,星湖学派的鼻祖,是全面研究汉译西学书而开启“西学”之路的一代宗师。他曾阅读过的汉译西洋书及文物达二十余种。他对西学的认识,对天文、历法、数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给予积极肯定,而对天主教的教理,则以补儒论的观点加以理解和肯定。他说“其学,专以天主为尊。天主者,即儒家之上帝,而其敬事,畏信,则佛事之释迦也。以天堂、地狱为劝惩,以周流道化为耶稣。耶稣者,西国救世之主也。”<sup>③</sup>他认为,天主教信奉的天主,可视为儒家的上帝,其信仰行为与佛教相似。他曾说服斥教弟子慎后聃:“西泰之学……非如佛氏之徒,诬世而已。大抵,西国中华八万余里。而彼耶稣会诸士航海远来,少无拘恋之意,及达中国,则官之而不拜,禄之而不受,独眷眷于扬其道而教天下。……人或谓其远来之意,实欲张伪教,而陷一世。则吾将以百口保其必不然也。至其天之说,昧者瞠焉。而今以经传所载上帝鬼神之说观之,则亦有嘿相契者。此中士斥天主之说,所以见屈于西士者也。然则君今日之斥,亦恐有未深考者也。”<sup>④</sup>可见,他对天主教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李瀛对天主教的关心,对其弟子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李檠、李承薰、权哲身、李家煥、丁若镛等朝鲜天主教信仰共同体的创始人物都是继承李瀛西学思想的星湖学派的杰出学者。

星湖学左派核心人物对西学的关心超出“器”的范围,接受了天主教。1783年,李承薰因传教的需要随其父出使中国,访问北京的天主教堂,第二年,在北堂领洗入教,回国后为其他信

① 朝鲜后期以近畿为中心活动实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星湖李瀛,其学风带有浓厚的现实改革主义倾向。

② 杨雨蕾《16至19世纪初中韩文化交流研究——以朝鲜赴京使臣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第90~103页。

③ 李瀛《星湖僊说·天主实义跋》

④ 慎后聃《河滨集纪·闻论》卷2,内篇。

徒授洗并组成教会组织，进行传教活动。可见，天主教传入朝鲜是在 18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没有西方传教士进入本土的情况下，一些实学派人士在接触和理解从中国传入的汉译天主教教理书的基础上，主动到中国天主教堂领洗入教实现的。

## 二、天主教在两国初始传播经过及遭遇

明末清初，由于天主教传入两国的时间、途径及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不同，初始传播的经过及遭遇也不尽相同。

### 1. 在中国的传播经过及遭遇

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的传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明末至清康熙朝前期，这个阶段因得到了明清两朝统治者的支持，传播顺利、发展迅猛。第二阶段是自康熙朝后期至乾隆年间，这个阶段由于受到清朝政府的抵制，传播受挫、发展缓慢。天主教之所以在明末和清朝康熙朝前期在中国传播比较顺利，是因为利玛窦等西方耶稣会士针对儒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环境，采取了行之有效的传教策略：首先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采取“合儒”、“补儒”的适应策略。其次在传播方法上争取士大夫直至皇帝的支持，以学术为媒介，借西洋科学、哲学、艺术来吸引士大夫阶层。

随着天主教教势的发展，一些西方传教士及罗马教皇对天主教做儒教的附属品不满，为了达到一教独霸天下的目的，开始对儒教发难，导致了“礼仪之争”。“礼仪之争”，使中国上层社会对天主教的热情降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失去了保护伞。1773 年罗马教皇下通谕，解散耶稣会，至此，自 1583 年在华进行 190 年传教活动的耶稣会，结束了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之后，活跃在中国的传教会主要是遣使会、方济各会和外方传教会。耶稣会被解散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陷入低谷，虽然中外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仍然秘密地进行着，但信徒的人数明显减少，传教的中心也发生变化。

### 2. 在朝鲜的传播经过及遭遇

朝鲜天主教是在没有西洋神父传教活动的情况下，以中国为媒介得以传入。朝鲜天主教信仰共同体的创立及发展与星湖学少壮派人士李檠、李承薰、权哲身等人物的努力分不开。李檠是朝鲜近代天主教的发起人。他潜心研究从中国传入的汉译西学书籍，并倡导实践西学运动。他信仰天主教，并尽力传道，成为朝鲜天主教会的领导人。1779 年，李檠与权哲身、丁若铨等学者，在汉城组织召开讲学会。李檠把天主教教理与儒教、佛教及民间信仰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宇宙中存在着造物主——天主，给人不死不灭的灵魂，人死后要受赏罚，或升天堂或下地狱。他认为天主教是上帝的真道，应该信仰，其他学者也都欣然同意。他们根据利玛窦《天主实义》，每天祈祷、省察，规定每月的七、十四、二十一和二十八日停工，全心祈祷，恭敬天主。但他们不懂如何做礼拜，如何举行授洗入教仪式。于是决定派人去北京的天主教堂，向西洋神父请教。于是，1783 年冬，李承薰随其父出使中国，访问了北京天主教北堂，拜访葛兰孟（一说甘若翰）神父，请求领洗。1784 年葛神父为其授洗，赐教名伯多禄。李承薰受洗入教后，带了许多教义书、十字架、苦像、念珠、圣像等回到朝鲜，又给同门学者李檠、权日身授洗，三人成为朝鲜天主教信仰共同体的创始人。之后，又给数十名信教者授洗，包括权日身的同乡丁若铨、丁若钟、丁若镛三兄弟及李家焕等，构成朝鲜天主教运动的核心人物。<sup>①</sup> 他们组织慕道团，创立天主教信仰共同体，进行传教。这是世界传教史上罕见的没有传教司铎的情况下建立的教会组织。

18 世纪后期天主教在朝鲜初始传播时期，信仰共同体的核心人物都以“补儒伦”立场接受

<sup>①</sup>（韩国）赵珧《朝鲜后期天主教史研究》，高丽大学校民族文化研究所，1988 年版，第 30 页。

天主教信仰。如丁若镛否认朱子的“太虚”和“理”具有创造万物之力的见解，据《诗经》里的“唯天生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的思想，确认“天”（上帝）就是创造主，具有降临人间主宰并滋养世上万物的能力，必须以“诚敬”之心来尊奉“天”。<sup>①</sup>李檠在其著作《圣教要旨》中，广引了先儒的“上帝”、“事天”、“忠孝”、“诚敬”、“人心道心说”等儒家伦理思想，主张按照“致君泽民”、“正心诚意”来尊奉上帝。丁若铨则将天主为万物之根源的思想与性理学相联系，《十诫命歌》中写道“士人议论阴阳太极，但世间万物均由天主所生，因此应信仰天主”。同时在他的“安息日”歌词里反映了东方传统儒学的礼俗意识“古人尚云：人生七十古来稀，男女七岁不同席。故有一周七日中，六日应勤勉努力，第七日要尊奉天主”。<sup>②</sup>

天主教传入朝鲜是中国发生“礼仪之争”及耶稣会被解散之后。由于天主教教理与朝鲜向来崇奉之儒学理论相悖，而罗马教廷否定利玛窦之容忍祭祖祀孔的传教法，教徒均埋主废祀，而且男女混杂，因此传入伊始就被大多数儒学人士所不以为然，视其为无父无君、悖伦灭性如禽兽。朝鲜统治阶级视其为反性理学伦理规范，违背儒家传统礼仪，扰乱封建身份等级秩序的邪教异端，自始至终，严厉取缔，在短短17年（1784~1801）中经历了“乙巳秋曹摘发事件”、“珍山事件”、“辛酉教难”等多次教难之后，陷入低潮，直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朝鲜与法国签订《修好条约》为止。1785年3月，朝鲜天主教会被告刑曹禁吏所发现，数位教徒被捕，教会书籍与圣像被没收，史称“乙巳秋曹摘发事件”。摘发事件发生后，朝鲜朝廷上下发出斥邪通文，指责天主教之害，如洪水猛兽，请严禁之，并把天主教传入之根源归结为自北京购入的汉译西学书。于是朝廷下令义州地方官府严查书籍“又言近来燕购小册子，皆非吾儒文字，率多不经书籍，左道之炽盛，邪说之流行，职由于此。……请另饬湾府书册之不当购而购来者，昭察严禁。”<sup>③</sup>并禁止出使中国使团成员与中国文化人交游，甚至又令备边司严禁异端杂书之流入：“凡系书籍涉于左道不经异端妖诞之说及杂术方书，一切严防。毋论译官及三使臣，所属如有潜贸之事，即其地摘发，烧火状闻，犯者置之重辟。”<sup>④</sup>摘发事件发生后，朝鲜天主教信仰共同体的传教活动从首都汉城及京畿道，向忠清道、全罗道等地方发展。

1787年，朝鲜朝廷的禁教政策稍为松弛，权日身、李承薰等再次聚集失散的教徒，进行传教活动。但在传教礼仪上遇到一些问题，即教会的七圣事、按教礼，除了授洗之外的其他圣事，必须由正式获得神品权的神父或主教来主持。而朝鲜天主教会，在没有主持圣事的正式神职人员的情况下，实施着假圣事执行制度。为了解决传教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决定派遣信徒尹有一到北京，拜见当时兼朝鲜宗座署理的北京主教方济各会的汤士选传教士，请求他向朝鲜派传教士指点迷津。但朝鲜天主教信仰共同体是在不了解中国“礼仪之争”的背景下成立的，大部分教徒是通过耶稣会士出版的汉译天主教教理书，从“补儒论”立场接受天主教信仰的。1789年尹有一来到北京时，中国“礼仪之争”已告一段落，各传教团体严格遵守罗马教皇的禁令，不准祭天、祀祖。汤士选告诫尹有一：祭祖是有悖于天主教教义的迷信行为，应当禁止。1790年，尹有一回国传达关于“礼仪之争”及耶稣会解散之事，依汤士选的教导，宣布祭祖是异端行为。此时恰好全罗道珍山的天主教信徒尹持忠的母亲去世，因尹持忠既不设神主牌位，又不举行祭祀仪式，而遭到非议，被告到官厅。结果尹持忠及其外从兄权尚然被判为“无父无君”罪处以死刑。朝廷下令搜查焚毁西学书，包括弘文馆等官府所藏的西学书，以及民间所藏的西学书，而且在北京的购书活动也被取缔，从此朝鲜接受西洋科学文明的渠道被斩断，史称“珍山事件”。

①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诗文集《自撰墓志铭》。

② （韩国）李元淳著，王玉洁等译《朝鲜西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86页。

③ 《正祖实录》，卷二十一，十年正月。

④ 《正祖实录》，卷二十一，十年正月。

“珍山事件”后，朝鲜天主教信仰共同体的指导层、信徒身份及传教方法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李家煥、丁若鏞等儒学人士因不能忍受“废祀焚主”而纷纷背教，指导层发生了分化。<sup>①</sup>即初期通过汉译西学书籍理解“补儒论”的天主教教理，以对新学问的好奇心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初期两班士人层，大部分以“珍山事件”为契机，脱离了信仰共同体，而受儒学影响不深，以纯粹宗教信仰入教的中人层人士成为信仰共同体的核心。信徒成分从士人层向中人及庶民层发展。庶民层信教动机带有现世求福、反对封建身份等级秩序、逃避现实、向往来世等倾向。中国的周文谟神父是天主教在朝鲜传播初始期，第一位到朝鲜的外籍传教士，为朝鲜天主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朝鲜天主教没有上帝之使者——神父，传教者自封会长，教友为教友洗礼，号为代父，不成体系，而且因遭受官方压制，在精神上急需得到安慰，因此向北京教区请求派遣传教士到朝鲜传教。1794 年底，周文谟神父受命夜渡鸭绿江，潜入朝鲜半岛进行传教活动。他于 1795 年进入朝鲜后组织明道会，下设若干个分会，以各分会长的家为聚点，定期举行传教活动，教徒人数迅速发展。1801 年国王纯祖以 11 岁的幼龄继王位，掌握实权的保守派对天主教徒采取更加严厉的镇压措施，大肆搜捕天主教徒，进行血腥镇压，结果天主教创始人及核心人物先后遇难，周文谟神父也被捕处死，殉教者达三百多人。这一镇压事件被称为“辛酉教难”。之后，天主教在朝鲜的传播陷入低潮，直到 1886 年朝鲜与法国签订《修好条约》之后，才得到合法的宗教地位。

### 三、天主教在两国的的发展状况

明末清初，由于天主教传入中朝两国的时间、途径及社会环境不同，其发展状况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在教会的组织机构及发展规模上。在组织机构上，天主教在中国的初始传播直接受西方天主教会的指导及管理，自上而下有着完备的组织机构、规范的传教规则、专职的传教人员，而且传教活动在教堂公开进行。传教士在清廷禁教之前以外国传教士为主，之后，以华籍传教士为主，信徒具有社会性、广泛性。而朝鲜的天主教会还没有规范的组织机构，只能称作一个信仰共同体；没有规范的传教规则，传教活动及仪式还具有较大的自主性、隐蔽性；信徒具有浓厚的家族特点，缺乏社会性、广泛性。中国主教周文谟进入朝鲜后，组织了信教团体明道会，其下设若干分会，但没有公开进行传教活动的教堂，都带有地下组织的性质，以分会负责人的家作为据点，秘密进行传教活动。在发展规模上，在中国，西方耶稣会士适应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传教策略，得到士大夫及皇帝的支持，发展迅速，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明末的 1636 年信徒有 38,000 多人，到 1650 年有 15 万信徒，教堂分布在除了云南、贵州之外的各个省份。而到 1701 年左右，全国有 257 座教堂、106 名传教士，教徒达到 30 多万人，分布在全国 14 个省份，其发展达到了高峰。当时中国人口约 1.2 亿，教徒人数占人口总数的 0.25%。而在朝鲜，1784 年，李承薰在北京的天主教堂领洗入教，回国后创立信仰共同体，进行传教活动。朝鲜教会组织形成初期信徒有 1 千名，到 10 年后的 1794 年增加到 4 千人，1795 年中国天主教主教周文谟神父秘密进入朝鲜进行传教活动后，有了很大的发展，教徒人数猛增，到 1801 年“辛酉邪狱”前信徒人数发展到 1 万多人。1799 年朝鲜人口有 7,412,681 名，<sup>②</sup>天主教信徒人数占总人口的 0.14%。教徒主要集中在首都汉城及京畿道的杨根、骊州一带，忠清道的内浦地方，全罗道全州等局部地域。但如果考虑到朝鲜天主教的传播历史只有 17 年（1784~1801），其发展速度也是可观的。

① 赵珧 《朝鲜后期天主教史研究》，高丽大学校民族文化研究所，1988 年版，第 78~79 页（表 3）。

② 《朝鲜王朝实录》，《纯祖实录》元年十二庚午条。

## 结束语：天主教在两国初始传播产生的影响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朝两国的初始传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耶稣会士的首要目的虽然是传教，但其采取的“学术传教”策略却与其目的互为表里，在传教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虽然耶稣会士“学术传教”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就其本质上说，不具备近代性，但对当时的中国士大夫却“无疑是一种少闻少见的异质文化”。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指出“自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人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情况外，几乎一书不读，学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艾儒略、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年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徐光启）、李凉庵（李之藻）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此后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到利、徐诸人的影响不少。”<sup>①</sup>同时，来华耶稣会士采取的“学术传教”策略，不仅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而且促成了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耶稣会士在研究儒学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把中国的文化典籍翻译介绍到欧洲，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朝鲜，天主教的传播及其发展，不仅对朝鲜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和体制提出了挑战，而且天主教的诸如超人间、超自然的上帝观，基于灵魂不灭说的伦理道德观，以及对人权的平等要求等西方思想，为以后朝鲜近代化的到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近代以前，朝鲜王朝为了取缔、制止天主教的传播及发展，禁止朝鲜使臣在中国的购书活动及文化交流活动，致使朝鲜被完全隔离在世界发展潮流之外。

（责任编辑：袁朝晖）

---

<sup>①</sup>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1985年版，第30页。